

在超越中复兴:吉登斯“第三条道路” 的“后社会主义”特征

王木森^{1,2}

(1. 上海师范大学 法政学院,上海 200234; 2. 中共宁海县委党校,浙江 宁海 315600)

摘要:运用文本分析法,探究吉登斯“第三条道路”政治的内在特征。分析认为:吉登斯超越左与右、复兴社会民主主义、用伦理社会主义规训资本主义来建构的“第三条道路”政治是“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而这种在超越中复兴则是“第三条道路”的鲜明“后社会主义”特征。

关键词:吉登斯; 第三条道路; 后社会主义; 超越中复兴

中图分类号: D09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1-6248(2012)04-00103-09

伴随启蒙运动开启的现代性的高反思化、全球化,人类陷入了后传统性、不确定性。诞生于现代性的主流意识形态陈腐、枯竭,尤其是1989年东欧巨变和1991年苏联解体,革命社会主义终结、议会社会主义危机,自由民主制的资本主义成为没有敌人的“别无选择”。所有这些被与贝克、鲍曼并驾齐驱的当代著名三大社会学家之一的吉登斯称为“21世纪是‘后社会主义时代’”,即用伦理社会主义规训经济资本主义的世界。至此,吉登斯开始了从社会学向政治哲学的开疆拓土。他坚持超越政治的基本价值,进行左右对话,达至意识形态光谱的中间偏左位置,实现复兴社会民主主义的内在目的,并使其现代化,建构“第三条道路”政治应对“现代性的后果”,并为左派政治实践提供一个超越老左派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政治激进主义框架。故而,超越中复兴被吉登斯刻定为“第三条道路”政治鲜明的“后社会主义”特征。

一、超越:“第三条道路”的基本价值

价值理性是逻辑建构的前提。吉登斯“第三条道路”接受了‘1989年及其之后’的逻辑,即在当代政治中,左和右在许多方面仍然有效,但同时还有许多议题和问题无法用左和右的立场加以阐明^[1],只能超越老派的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因此,在化解后传统社会的不确定风险中,吉登斯建构后社会主义的“第三条道路”政治必须扬弃传统左与右,同时超越左与右,所以,“超越”是建构“第三条道路”政治的基本前提和价值取向。

(一) 没有敌人的时代

当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2个现代性的孪生兄弟在同一时空遭遇时,人类历史进入了敌对斗争的时代。资本主义现代性作为启蒙的产儿登上人类历史舞台之后,它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力量、用法术般的手段,“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

收稿日期: 2012-08-05

作者简介: 王木森(1978-)男,陕西山阳人,中共宁海县委党校讲师,上海师范大学法学硕士研究生。

界”^[2]。资本主义现代性的主人——资产阶级,用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改造着人类世界的一切,它使“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褻渎了”^[2]。资本主义现代性及其主人在变革一切、创造一切时,也正在不知不觉地创造着自己的同胞兄弟、创造着自己的掘墓人——社会主义现代性及其主人——“现代工人,即无产者”^[2]。因此,在资本主义现代性诞生并阔步前进时,它的敌人“社会主义现代性幽灵”就开始缠绕着它。

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的战斗檄文《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资本主义的梦魇,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幽灵正式在欧洲上空游荡。从此,有伟大理论指导的、有先锋队组织领导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开展的社会主义革命就成为了资本主义时代挥之不去的噩梦。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使社会主义现代性及其主人——工人阶级登上人类历史舞台,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孪生兄弟变成了其真正的、强大的敌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欧、中国等先后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权,世界社会主义的力量进一步壮大,整个世界“一球两制”,整个人类分为两大阵营。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敌对阶级的斗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敌对意识形态的斗争、资本主义道路制度和社会主义道路制度两大道路制度的斗争、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两大阵营的斗争、资本主义现代性和社会主义现代性两大同胞兄弟的斗争,绘制了人类历史上长达半个世纪的局部“热战”和总体“冷战”的现代性景观。

20世纪末“没有敌人的时代”降临了。1989年东欧巨变、1991年苏联解体,冷战宣告结束,人类来到了吉登斯认为的“没有敌人的时代”。西方学者迫不及待地宣告“在20世纪即将结束的今天,我们见证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最后胜利。无论是以前时代的国王和王子,还是我们自己时代的委员和代表,都发现了政治权力在抵制这一世所仅见的最为强有力的经济体系所释放出的变革力量时的无效”^[3]。“1989年革命”^[4]后,吉登斯认为东欧、苏联社会主义终结,资本主义现代性打败企图埋葬它的敌人——社会主义现代性,成为历史竞争中唯一胜出的力量,资本主义似乎是人类真正的进步力量,代表着人类社会前进的方向,除了资本主义之外,人类已别无选择。对于吉登斯来说,资本主义就是未来;

对于资本主义来说,“随着冷战的消融,大部分国家不再有敌人了”^[4]。因此,在敌对斗争的冷战时代形成的“冷战思维”,即进步与保守、自由与专制、民主与暴政、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这2种左右不同意识形态之间对立和斗争的思维方式已经不合时宜;在“随着社会主义作为一种计划经济管理理论衰亡”的后冷战时代,“左和右之间的主要分界线已经消逝”^[5]，“如果资本主义之外不存在任何社会或经济体,左和右的划分也就不再像往昔那样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6]。没有了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这2种思想和制度的冲突,没有了所谓改良社会主义与革命社会主义的历史分野,两极对立意识形态中的一极——马克思意义上的左的社会主义现代性不复存在。因此,吉登斯认为,在没有外部敌人和别无选择的今天,继续固守左与右的冷战传统还有什么意义呢?必须放弃那种认为“左”的社会主义和“右”的资本主义是政治中唯一和最终分界线的观点,从而使超越政治成为可能。

(二) 左与右部分有效

“全球化同共产主义的衰落一起改变了左和右的形态。”^[5]传统意义上的左和右已经逝去,但左与右的划分是否已经消失了?是否应该放弃左与右呢?吉登斯借用意大利政治学者博比奥的话说,政治的实质就是针对相反主张和政策的斗争,左和右是一个硬币的2个侧面,二者在不同时期不同背景下是变化的,但在同一时间内,左和右的划分是存在的,不存在既左又右的观点。在吉登斯看来,随着后传统社会各种不确定性风险的增加、全球化的扩展、共产主义的衰落,那种塑造了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阶级政治已经离我们远去,但作为推动现代性发展动力的解放政治依然有效,其作为现代性的核心所追求的实现人类解放、确立人的主体地位、消灭压迫奴役剥削、消除不平等的“他人的政治”远未实现,实现社会正义、团结、平等、保护弱势群体仍然是奋斗目标。正因如此,吉登斯才不愿意把这种远未完成的现代性称为后现代性,而更愿意称其为晚期现代性或反思现代性。由于解放政治仍然存在,吉登斯认为“左派和右派的价值的确存在分歧”^[6],他在评价博比奥的《左与右》一书观点时说“左与右的划分依然存在。他是否正确?”,但“我想他只是部分正确”^[6],吉登斯比较认同博比奥所说的左与右的划分现在没有消失、以后也不会消失的观点,但左与右在全球化的风险社会已经发生了变化。

一个日益“失去控制的世界”、“已经变得激进

的保守主义遇到已经变得保守的社会主义”^[7],这就是当前存在并已发生变化了的左与右的当下形态。吉登斯通过对影响意识形态的“全球化、传统和不确定性”的考察后认为,在反思现代性时代,以前激进的并代表人类发展方向、试图控制社会、控制人类、控制未来的政治激进主义,即社会主义在全球性风险、后传统秩序和人为不确定性面前已经虚弱,只能抓住曾经激进的“福利国家”这一救命稻草,已经没有了往昔的万丈雄心,从而变得保守。以前保守的、以保存权威、保持忠诚、保护传统的保守主义,逐渐从维护封建旧制度和封建等级、反对启蒙运动、社会发展理论和新生的资本主义,反而蜕变为维护、发展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新右派,并走向了自己的反面,从而变得激进。尤其是在吉登斯视野下的“1989年革命”、“社会主义终结”、“反思性的后传统秩序”^[4]的今天,推翻资本主义的极左革命社会主义不复存在,力图改造资本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更加保守,维护并发展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更加激进。显然,左翼与右翼就以这种方式存在。

在充满错位和不确定的世界里,退出激进主义的左翼社会民主主义和走向激进的右翼新自由主义是否有效呢?吉登斯的答案是“左与右的划分在某些政治领域仍然相当有效,但仅限于这些领域。”^[6]也就是说,还有一些领域并不属于左与右的范畴,继续划分左翼与右翼是没有意义的。比如生态恶化、重新定义充分就业、创造工作岗位、身体、性、自我、自我认同和生活方式的选择等都不再是左与右的议题。对于这些后传统社会的微观政治议题,是不能用宏观的解放政治来解决的,传统的以及变化了的左派和右派都是对此无能为力的。吉登斯主张用一种选择生活方式、选择身份和相互关系的生活政治来应对,而不是用追寻生活机会的解放政治来解决。

因此,在后传统秩序背景下,“在回应全球化的过程中,出现了重新定义左派和右派的倾向”^[6],即解放政治领域的左与右划分是有效的,生活政治领域的左与右划分则是无效的。因而,左与右只能是部分有效和部分无效。对于这种尴尬的严峻情势,吉登斯认为,要化解高度现代性的风险,就不能固守僵化的原教旨主义,而应该创造新措施,以创新性的思维超越资本主义内部传统的左右政治意识。

(三) 超越左与右政治

在“没有敌人的时代”和“没有了敌人的国家”,保持或重新获取合法性越来越取决于化解风险的能

力,提高行政管理的效率。坚持灵活的非原教旨主义原则,就是要扬弃传统左与右,超越变化了的左与右,这是吉登斯“超越左与右政治”的真正内容。传统的左就是企图替代资本主义的革命社会主义,传统的右就是认为资本主义是完美无缺、无可挑剔、不容否定的保守主义,其新近形态就是新自由主义。苏联、东欧社会主义消逝后,吉登斯认为,扬弃传统左与右就是否弃革命社会主义的经济计划控制模式和极端资本主义的贪婪弊病,将社会公正注入资本主义之中,实现社会主义的公平与资本主义的效率的有机结合。超越变化了的左与右就是要超越死守传统“福利国家”的老社会民主主义和重新包装了市场原则的新自由主义,实现政府与市场的平衡。

超越政治就是对话政治。超越左与右的有效方法就是左与右的对话。吉登斯认为,不管在何种社会环境中,价值冲突是最激烈和持久的,能够很好地解决价值冲突的方法都是有限的,化解价值矛盾的方法一般有地理分离、退出、对话和武力或暴力4种^[7]。地理分离是一种消极的做法,主要是基于时空的脱域,即把存在矛盾和冲突的双方进行时空隔断,使其处于不同的空间,阻断其冲突和斗争的机会,从而使冲突的个人或者相互敌视的文化几乎没有联系或者没有直接的联系来实现其共存。退出则是一种更积极的方法,在吉登斯看来,冲突严重且势均力敌的双方如果互不妥协而退让,只能同归于尽、一起毁灭,但为了不致于毁灭,就可以像离婚一样,不能与其对象生活在一起的个人或集团只要分离或者离开,退出竞争就可以。温和有效的方法是个人和文化差异的对话,对话是一种基于双方的相互理解为基础,并以发挥各自的积极作用为目的,实际上可以说是在妥协退让基础上的积极合作与优势互补、共同提高的过程。最激进的做法就是通过武力或暴力来解决价值冲突。吉登斯认为,在全球化的社会,这4种选择的前2种已经很少了,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地区、文化或者大型集团能够在全球的世界主义秩序之外。而对话与暴力则是沿着可能出现的原教旨主义的边缘伸展的,暴力往往是利益冲突和权力斗争导致的,其在解决价值冲突时会导致更严重和无法控制的矛盾和离心,常常被对话所代替,对话是一种有效并直接反对原教旨主义的非原教旨主义力量。

对于全球性风险的后传统社会而言,人类社会内部的人为不确定性需要左右政治意识共同面对,因而选择对话性的超越左右政治是复兴社会民主

义的有效途径。

二、复兴:“第三条道路”的 内在目的

目的理性是理论建构的方向。吉登斯认为,“第三条道路”首先是适应变革的努力,总目标是帮助公民在这个大变革时代找到自己的方向,内在规定是重铸新时代的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观念。用英国前首相布莱尔的话说,“第三条道路是通向现代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和成功之路”^[8]。吉登斯于1994年提出了超越左右政治的价值,1998年又更进一步表达了:“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5]。这些努力正如吉登斯指出的“我们生活在一个被根本性破坏的世界里,它需要根本性的补救。”^[9]因此,在既往意识形态衰竭的后传统社会,实现社会民主主义的现代化,复兴是吉登斯构建“第三条道路”的内在目的。

(一) 既往意识形态枯竭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随着社会存在的变化而变化。吉登斯虽然对其进行了卓著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10],但却无意中陷入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路径依赖,自觉或不自觉地践行着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1. 现代性的后果

吉登斯确信人类现在正生活在现代性的全球化时代,而这种时代又是一个后传统社会的风险失控时代。现代性的时空分离、脱域机制、制度性反思三大动力机制推动着人类进入晚期现代性,从而使前现代存在的外部自然风险演变为内部的人为风险,在追求确定性中演化为不确定性,并且全球肆溢。吉登斯把现代性与全球化的长期相互作用的成熟作品命名为后传统社会。这种社会是一个风险社会,充满了各种不同的人为不确定风险。这些风险除了被吉登斯归结为现代性四维度导致的“现代性的后果”(经济增长机制的崩溃、极权主义的增长、核冲突和大规模战争、生态破坏和灾难)之外,还包括吉登斯观察到的现代性更具体的风险景象:(1)高强度意义上的风险的全球化,如核战争对人类生存的威胁;(2)突发事件不断增长意义上的风险的全球化,这些事件影响着每一个人,如全球化劳动分工的变化;(3)来自人化环境或社会化自然的风险,人类的知识进入到物质环境,如日本福岛核泄漏导致的

辐射危害;(4)影响着千百万人生活机会的制度化风险环境的发展,如美国、欧洲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海啸;(5)风险意识本身作为风险,风险中的‘知识鸿沟’不可能被宗教或巫术知识转变为‘确定性’;(6)分布趋于均匀的风险意识,我们共同面对的许多危险已为广大的公众所了解;(7)对专业知识局限性的意识,就采用专家原则的后果来看,没有任何一种专家系统能够称为全能的专家”^[11]。吉登斯认为,这些风险具有不可预测性、不可计算性、实验性和全球性四大特征,并已渗入人们日常生活的细胞,具有极大破坏性,致使人类陷入道德危机、信任缺失和生存焦虑的危险状态。

2. 意识形态危机

在晚期现代性风险全球逃逸和人类反思性增强的失控世界,吉登斯认为,缘起于现代性的社会主义、保守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三大政治意识形态都出现了危机。第一,强烈反映启蒙运动世界观的社会主义,由于它对社会生活的“控制论模式”以及只能适应低反思社会和确定风险,所以,其组织化的指令性已无法适应高度现代性下的高层次输入、高反思性和高风险性,并在全球化和信息知识化的新革命的推波助澜下,出现了“1989年革命”的“终结”^[4];第二,维护传统的保守主义,在后传统社会中被反思性消解,同时,因其对过去进行无反思保存、用传统方法维护传统而变成了原教旨主义;第三,自由主义的当下形态——新自由主义,因其2个同等重要的组成部分——市场原教旨主义和保守主义之间存在的张力也陷入了某种困境之中。新自由主义既钟情自由市场,又固守传统的家庭和民族,这种个人主义和自由选择在遭遇传统家庭和民族认同的边界上只能戛然而止,否则就陷入自相矛盾的悖论之中。市场力量的“不断革命”不仅消解传统,而且削弱传统权威、瓦解地方共同体,从而使新自由主义又制造了新的风险和新的不确定性。

吉登斯认为,“如果社会主义和保守主义已经解体了,而且新自由主义是充满矛盾的”,“资本主义与自由民主制的结合为创造社会团结提供的手段微乎其微”^[7],那就“清晰地揭示了被认可的政治意识形态的枯竭”^[9],而“我们生活在一个被严重破坏的世界中,这个世界需要激进的药方”^[7]。因此,吉登斯站在左翼立场上,建构第三条道路政治,超越左与右,复兴后社会主义,复兴社会民主主义。

(二) 后社会主义复兴

人类面对这一现代性风险的严峻挑战,莎士比

亚早在《哈姆雷特》中就给予了警示“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a question”,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问题。其实,在这个问题的萌发阶段,马克思就提出用“以实现人类解放为神圣使命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来应对。而在这个问题日益严峻并大规模爆发时期,吉登斯认为,作为一种经济管理理论、历史解释理论、社会控制理论的社会主义已经无能为力、无济于事,其中20世纪末苏联、东欧社会主义体系的瓦解就是最雄辩的证明。

1. 社会主义终结

就经济管理理论的社会主义而言,米塞斯、哈耶克和其他右派对其中的计划缺陷的认识被吉登斯认为是一贯正确的。米塞斯认为,致富激励的自我性、利润最大化和经济参与者寻租的必然性以及交易瞬息万变的市场使得即使是一个最具灵敏洞察力的计划机构,甚至一台超级计算机也不可能准确决定商品的价格和经济的微观情况。哈耶克认为,市场使实践的、默示的知识发挥了作用。由于市场的复杂性、可变性和使用中给予的知识与习惯以及实践中的知识等因素,使得计划经济不可能把实践知识从根本上转向成功的经济计算,也不可能由一个具有指导性的智慧主体来替代市场竞争中价格提供的信息。实践的本土知识、高度反思和全球化的渗透和分割,这些变化了的环境,在吉登斯看来,使“凯恩斯主义退缩了,苏联经济模式停滞不前了”^[7],因而“米塞斯和哈耶克对中央计划的‘认识论反对’是正确的”^[7]。

就历史解释和社会控制理论的社会主义来说,吉登斯认为,社会主义是启蒙运动的继承人,是自己命运的主人、社会的主人。社会主义这种态度本身就是一种历史自然观,历史是按照人类目的形成的自然,这种历史自然也是一种资源。社会主义这种历史观、自然观,是把历史自然当作人类的工具和手段,而没有把其当作人的“伙伴”。这样“历史,在其重大的和革命的转折点上是由被压迫者创造的”^[7],社会中的被压迫者在资本主义现代性时代被马克思称为无产阶级。吉登斯认为,这些社会先驱用革命手段推动历史和社会的转换与进步,“革命代表旗帜,代表勇敢,是尽可能以最强有力的方式控制的历史剧”^[7]。吉登斯认为,正是这些企图控制历史、控制自然的理论使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容易走向极权、强化监控、远离民主、掠夺自然、趋向暴力和战争,从而使现代性的风险严重化;经济管理、历史解释、社会控制理论的弊病在晚期现代性时

代,葬送了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

2. 后社会主义降临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东欧、苏联社会主义崩溃,在吉登斯看来人类进入了“后社会主义时代”。“后社会主义时代”是一个资本主义没有替代、别无选择的世界。资本主义是进步的唯一力量,但资本所有者已经失去了很多权力,国家也控制了很多以前掌握在个人资本手中的决策权和自然,国有化和福利制度在资本主义中不仅存在,而且有了很大的发展,所以,“像英国这样的国家根本不能再叫资本主义”^[7]。但吉登斯认为,即便如此,“难道资本主义体制一定会取得不受挑战的统治权吗?我认为不是这样。不受制约的资本主义市场依然有许多马克思所指出的破坏性后果”^[7],如增长主导型的伦理观、普遍商品化、经济两极化和可能出现的后匮乏秩序。对于资本主义来说,必须克服其强制性,复兴受到压制的道德关怀。对于社会主义来说,必须抛弃革命控制理论,弘扬没被重视的道德伦理。因此,吉登斯认为,在“后社会主义时代”,就是要用伦理社会主义改造经济资本主义,“第三条道路”的使命就是用社会主义的基本伦理理想,在社会主义经济规划失信的地方为人类社会和经济发展创造美好的生活。

(三) 社会民主主义复兴

构建“第三条道路”政治以实现社会民主主义现代化,是吉登斯复兴“后社会主义时代”意识形态,从而应对反思现代性风险和貌似胜利的新自由主义挑战,并为左翼政党执政实践提供理论指导的历史之需。

吉登斯认为,在“后社会主义时代”,虽然经济管理、历史解释和社会控制的社会主义已经消逝,但是哲学伦理学的社会主义依然富有说服力,“第三条道路”作为“后社会主义时代”意识形态就必须捍卫社会主义伦理价值。在社会主义的历史实践中,现实类型学的社会主义被吉登斯分为东欧、苏联的革命社会主义和西欧、北欧的议会社会主义,其中议会社会主义就是社会民主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在反思现代性时代,如何使社会主义的价值和理想再展现其意义呢?吉登斯给出了理论的阐释,那就是建构“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5]。

全球化正在改变我们生活着的社会,传统和习惯正在退出我们的生活,人类生活在一个更加开放、更有反思性的生活政治和福利共识的瓦解、马克思

主义受质疑及社会经济技术变迁之中。面对这些全球变迁,新右派的态度是任其发展,尤其是以里根、撒切尔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沉溺于“市场解决一切”、厌恶“政府就是问题”的论调,似乎其政治政策在全球范围内取得了胜利。实际上自由资本主义导致了許多马克思所诊断出来的弊端,如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点燃的全球金融危机和当前主权债务危机等就是其生动的表现。老左派对于这一情势只是简单抵制。吉登斯认为,社会民主主义在全球风险环境下虽然没有被排斥到边缘,但是已经正处于意识形态混乱的衰落状态。对于一度代表进步的激进左翼而言,吉登斯认为,不能继续退却保守,否则就会被强势发展并日趋激进的新自由主义所取代,“现在已经到了社会民主主义者对这些实际上是站不住脚的观点(新自由主义的观点)发起反击的时候了”^[5],应该驾驭这一变迁,实现社会民主主义的现代化,从而达致社会团结和繁荣。

除了上述理论的需要必须复兴社会民主主义之外,20世纪末21世纪初世界范围内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工党等上台执政也需要进行理论创新。英国前首相布莱尔曾提到“政治的首要问题是思想问题。如果没有自己的强烈追求的目标和价值观念,一个政府无论占有多大程度的多数,都只会是无舵之舟,难以发挥作用。”^[12]西方的政党政治往往以选民投票为基础,左翼政党一直以获取蓝领工人阶级的支持赢得选举。但是,随着蓝领工人阶级人数的锐减、数量可观的少数派群体敌视并退出选举、女性大规模进入劳动力行列以及代际更替而出现的人们价值观的变化等,使得“以往一直作为投票和政治关系之基础的阶级关系已经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5],即按阶级划分选票已成为历史,左右两极格局日渐模糊,社会民主党派失去了为其提供稳定支持的阶级集团。虽然选情对左派党派越来越不利,但是到1998年中期,以社会民主党为代表的中左政党联盟赢得了西欧、北欧的政权而纷纷上台执政,这被称为世纪之交欧洲的一道靓丽粉红色。吉登斯认为,虽然胜利,但是这只是一场利用美国开发的传媒技术的传媒导向型政治的胜利,即“个人形象、象征舞台、声音的感染力、视觉效果”的“设计师社会主义”^[5]暂时征服了公众。这种天花乱坠的宣传背后没有必要可靠的思想理论支持,就会成为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最终悲剧。因此,吉登斯指出,“如果新工党只能让公众了解到一些运用传媒的实际技能,它在政治舞台上逗留的时间将不会太长,而它对社会民主复兴所作的贡献也将十分有限”^[5]。必须构建“第三条道路”政治理论来复兴传

统的社会民主主义,实现社会民主主义现代化。

三、超越中复兴:“第三条道路”的特征

吉登斯“第三条道路”坚持“超越左右政治”的价值前提、追求复兴社会民主主义的内在目的,使“第三条道路”深深烙上了超越中复兴的鲜明政治特征,彰显了“第三条道路”理论独具特色的政治风格,表现了一种“与时俱进(新进步主义)、豁达宽容(非原教旨主义)、追求实效(新实用主义)”的“后社会主义”政治意识形态魅力。

(一) 与时俱进的“新进步主义”

“新进步主义”永远是历史和时代发展的主题。20世纪初期的第一个新进步主义时代,是由美国中左政治为适应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开启的“新政”^[1],即建立在国家、工会和大企业之间协作的基础之上。第二个新进步主义时代,是由英美新工党和民主党为适应后冷战时代全球市场和知识经济而发起的“第三条道路”政治。吉登斯认为,高反思性的后传统社会的来临,国家管理经济生活和一再扩大社会福利的能力受到影响,需要引入一个“既不是老左派所赞成的官僚主义的和自上而下的政府管制,也不是新右派所渴望的干脆取消政府管制”^[1]的“新进步主义”。这种“新进步主义”,或称为“新发展主义”是坚守传统社会民主主义价值基础,超越左右政治分歧——政府和国家职能这个核心问题,并以机会均等、个人责任和公民与社会动员为基石的一种“新国家、新治理、新福利”的新政治框架。

1. 新国家

吉登斯“第三条道路”试图打造超越“认为国家是答案”和“把国家当敌人”的政府、市场和公民社会相结合的结构多元主义国家联盟。吉登斯认为,全球化的时空巨变、新知识经济和后传统秩序使国家面临新的挑战 and 机遇,“社会民主主义者应当在这个全球化的世界上为国家寻找一个新的角色定位”^[5]。全球化的后传统社会并未使民族、国家变成一种“虚构”;相反,全球化向2个方向渗透。第一,“向上渗透”的全球化,即全球金融市场、贸易、技术和知识经济创新打破了传统国家主权,削弱了民族国家权力,导致了国际合作加强、全球治理的“世界性民主”需要;第二,“向下渗透”的全球化,即非政府组织、利益集团和压力集团等公民社会以及市场的活动创造了新的需要、地方认同,所以也导致了对公民社会的要求。因此,必须使国家在以下8个方面发挥积极作用:(1)当垄断威胁到经济竞争

时维护竞争; (2) 控制自然垄断; (3) 创造和维护市场的制度基础; (4) 使公共产品、政治或文化避免市场的恶意侵扰; (5) 利用市场实现中长期目标; (6) 在微观或宏观上平抑市场波动; (7) 保障工人的物质条件和劳动合同; (8) 对天灾(包括市场引发的灾难性后果) 及时反应并加以解决^[13]。为此, “第三条道路”主张进行全面的一揽子改革, 界定新的民主国家。

吉登斯提出通过结构性的多元主义改革来改造政府, 构建新国家。第一, 以提高政府效率、提升政府形象为目标, “以最小代价获取最大收益”的生态学原则对政府进行结构性改革, 把政府建成能“像许多企业部门一样有效和行动迅速”^[1]的公共体; 第二, 国家应扩大在公共领域的作用, 复兴公共制度对其履行职能的信任, 进行更大的政府透明度和开放性的宪法改革, 建立预防腐败的新举措, 引入责任机制, 包括“民主化实验”, 如电子手段的全民公决、新形势的直接民主和公民陪审团、回应选民政治冷漠; 第三, 国家民主制度民主化, 重建政府与公民以及公民社会的直接关系, 重塑国家权威, 进行权力的双向流动, 向下分解权力, 把权力交给地方、地区甚至市场和公民社会, 向上则交给跨国机构, 如欧盟; 第四, 政府应该鼓励和发展教育、企业家文化、弹性、权力下放和社会资本, 通过多元主体分解风险, 提高国家治理风险的能力。

2. 新治理

在全球化的后传统时代, 不确定性风险和风险的不确定性增加, 传统的管理型政府已经不能有效应对。基于此, 吉登斯认为, “第三条道路”可以用“结构多元主义”政治来代替“设计选择”的政府与市场结合的二元论和要么把政府要么把市场看做协调社会领域手段的一元论, 以及把社群或市民社会意识视为社会最有凝聚力的、最终来源的风险治理主体观; 并指出, “只要以上三者中有一种居于支配地位, 社会秩序、民主和社会正义就不可能发展起来”^[1]。

新治理就是超越传统的政府是个问题和政府是解决问题的答案的非左即右的模式, 重新复兴不仅仅包括政府和国家, 还包括个人、企业、公民社会、跨国公司、国际组织等多个主体在内的多元机构, 实现权力的下放和转移来化解各种风险。新治理的基本特点是: 在政府、经济和公民社会之间进行平衡, 强调国家在社会力量之间发挥调节作用, 通过更新包容社会各阶层的“公民自由主义”来重建公共领域, 提高人们的“自理”、“自助”能力。“第三条道路”

在坚持政府能够并且应该在现代社会发挥重要作用的前提下, 与公民社会进行合作, 结成伙伴关系, 成为互相协作者、监督者, 使公民参与到治理之中, 以“积极政府”的治理取代传统政府自上而下的管理。

3. 新福利

构建多元主义的国家治理主体实现有效治理虽没取消传统的福利体系, 但还应对对传统的消极福利进行改革。因此, 吉登斯提出应建立社会投资型国家的积极福利社会, 卡尔松称其为“可持续的福利社会”, 托马斯·迈尔称其为“新福利”。

之所以要进行福利改革, 建立新福利, 不仅仅是因为新右派所批评的消极福利自身的问题是存在的, 而且吉登斯认为, 对福利制度的改革主要有3个原因: 第一, 现存的福利结构已不适应当前世界上的社会和经济变革; 第二, 至少在某些方面、某些国家, 福利国家难以为继, 削弱社会团结成为“道德公害”; 第三, 福利国家自身的局限和面对需要直接加以应对^[1]。投资型国家新福利的建立除了上述原因外, 还因为福利不仅是一个经济学概念, 并且是一个心理学概念, 因而, 福利必须在关注经济利益的同时还要关注心理利益的培育。

第一, 投资型国家的新福利既要解决经济安全和再分配, 也要重视财富创造, 坚持一种新的混合经济并以其为支柱。“新型的混合经济则试图在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建立一种协作机制, 在最大限度地利用市场的动力机制的同时, 把公共利益作为一项重要的因素加以考虑。”^[5] 其与过去混合经济的最大区别不是实现国有企业与私有企业的之间的平衡, 而是在此基础上还要尽可能实现2个新平衡: 国际、国家和地方各层次上的调控和非调控之间的平衡; 社会生活中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之间的平衡。第二, 改变福利过程中所蕴含的风险与安全关系, 建立一个在政府、企业和劳动力市场中的人是“负责人的风险承担者”的风险和利益共担的社会。第三, 转变平等观念, 确立无责任即无权利原则, 创造机会平等, 以最大程度地开发人类潜能取代“事后”分配, 发展一套促进经济增长的积极供方政策。

正如卡尔松曾经举得的例子一样, 投资型国家的新福利就是从“授人以鱼”到“授人以渔”^[14]。吉登斯认为, 这种积极福利是“把贝弗里奇所提出的每一个消极的概念都置换为积极的: 变匮乏为自主, 变疾病为积极的健康, 变无知为一生中不断持续的教育, 变悲惨为幸福, 变懒惰为创造”^[6]的新福利。

(二) 灵活宽容的“非原教旨主义”

反思现代性的全球化导致后传统秩序出现, 传

统并未消失但其重要身份发生了变化,传统受到公开质疑,必须进行自我解释。如何进行解释而保存自我,人类行动者可以有2种方式来应对。一是坚持原教旨主义方式,以传统的方法维护传统。吉登斯认为,“在寻求理性的全球化世界中,原教旨主义就是以传统的方式受到防卫的传统”^[4],即所谓的仪式真理或天启真理,反对话,拒绝世界性交往,往往以暴力方式解决价值冲突。二是采取世界主义的非原教旨主义方式,即以价值多元主义承认传统多样化,在对话过程中超越价值冲突,创造新传统,树立新权威。吉登斯在复兴“衰落的社会民主主义”、构建“第三条道路”过程中坚持超越左与右的非原教旨主义方式,在左右的价值冲突中开展对话,接纳新右派合理指责并吸收其合理内核,使日趋保守的社会民主主义与时俱进,成为后传统社会的“新激进中心”。

“第三条道路”对左右采取灵活包容的非原教旨主义态度,建立新的“中左平衡”。第一,在政治价值方面,接受社会正义中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反对极端自由主义,确定一种“无责任即无权利”的新的社会契约;第二,在经济方面,“第三条道路”分析了“经济管制+道德无政府状态和经济无政府状态+强有力的道德控制”的缺陷,提出一种超越性的“新混合经济”,实现管制与解除管制、社会生活的经济方面与非经济方面之间的平衡;第三,在国家与政府方面,主张政府在全球化趋势下的双向放权,政府行为少一些管理,多一些治理,掌舵而不划桨;第四,在超越传统福利国家上,转变为一种社会投资性的国家,确立风险和安全、个人责任和集体责任之间的新的平衡,福利投资不仅关注救济性分配,更应关注分配之后教育、人力资源、工作机会的创造和二次机会的供给;第五,在社会关系上,超越国家神话和市场神话,主张在国家、市场和社会之间建立一种互动平衡,确立一种反对排斥的“包容性”关系;第六,在国际问题上,“第三条道路”反对暴力和恐怖活动,反对强权干预,主张建立对话的民主、协商的机制;第七,在自然问题上,主张自然和人类的双赢战略,而不是单向度的索取^[1]。

(三) 追求实效的“新实用主义”

奥地利学者罗伯特·米奇克虽然讥讽吉登斯“第三条道路”是“不改变世界的哲学家”,但是英国学者大卫·米利班德却说,当我们把这一概念(“第三条道路”)扔进欧洲左派沉默的智慧之海时,听到了很响的“泼刺”之声,显然它已成为一种新实用主义政治时尚引领着21世纪初大西洋两岸的政治实

践。吉登斯的“第三条道路”承认现代性的各种风险,放弃“天命论”,用现实主义的态度诊断并分析现代性制度的发展趋势。同时,保持乌托邦式的社会主义理想和道德追求,把理想与现实相结合,摆脱左右意识形态桎梏的束缚,重视现实性的基本问题,超越左与右,勾画美好社会的轮廓,发展了一种利文斯通式的“激进社会主义”的新实用主义哲学。因此,“第三条道路”的“新实用主义”特色是“一种重新焕发生命力的批判理论,要把乌托邦主义和现实主义同等看待并且结合在一起”^[15]的乌托邦现实主义。

吉登斯以马克思改造世界的理论,抛弃欧洲口吐莲花地大谈空洞理论的高贵政治哲学,直面社会民主党面临的五大基本问题:(1)全球化——准确地说,在什么地方发生了全球化,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2)个人主义化——在什么意义上可以说,现代社会正在日益个人主义化?(3)政治上的左与右——为什么人们声称,这种区分已经陈旧过时了?(4)政治行动——政治是否正在走出传统的民主中心?(5)生态的必然性规律——社会民主党应当如何对待生态危机?^[5]吉登斯奉行强调人的不完美性、知识的零碎性、人类控制未来的局限性和社会发展的非直线性的哲学保守主义,以乌托邦现实主义的态度应付各种变化。他在科技造成的不确定性上采用细微差别立场,尊重传统和历史,以预防原则保护生态环境,务实地提出在经济效率、社会团结和生态持久3个目标上实现平衡来构建现代化社会民主主义理论解决上述问题。

“第三条道路”这种新实用主义主要体现在2个方面:一是理论上的兼容并蓄。吉登斯构建的“第三条道路”坚持超越左右政治的价值取向,汲取老左派和新右派的合理内核,扬弃二者不足之处,建构了一种富有创新性、时代性和实效性的理论框架;二是在实践上从实际情况出发,根据全球化的反思现代性风险的严重威胁、社会民主党和工党的政治实践需要和已有意识形态的腐朽陈旧、软弱无力,摆脱以传统方法维护传统的原教旨主义,整合左右意识形态的积极成分,开拓出一份具有21世纪新实用主义特征的新政治理论。正如布莱尔曾经强调的,为了赋予“第三条道路”价值以“实际效用”,“在很大程度上实用主义是必要的”^[12]。

四、结 语

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立足于现代性反思,以哲

学保守主义、非原教旨主义和乌托邦现实主义的态度和马克思变革世界的理论胸怀,对全球化现代性的后果、风险进行了独到的前瞻性分析,从而解构传统社会主义,建构后社会主义。他认为,反思现代性致使源于现代性的三大政治意识形态——社会主义、保守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衰竭,导致苏联、东欧革命社会主义崩溃,人类历史进入了资本主义成为别无选择和没有敌人的“后社会主义时代”;用伦理社会主义的道德价值规训仍有弊病的资本主义,坚持超越老左新右的价值前提、实现复兴后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内在目的,建构中间偏左的“第三条道路”来化解晚期现代性的高风险性、不确定性、后传统性,并为社会民主党、工党提供理论指南。因此,实现社会民主主义现代化的——“第三条道路”就具有超越左右、复兴议会社会主义价值的超越中复兴的后社会主义特征。同时,“第三条道路”从总的理想类型的角度看,既有公平也有效率,既有社会团结也有个人自由,既重现实也顾传统,是一个注重实效、切中实际、兼顾各方、综合平衡的政治框架。因此,吉登斯认为,“第三条道路”不是新自由主义的特洛伊木马,它能够在美国左派和欧洲左派塑造广泛的政治改革引爆火花,并为回击新自由主义和复兴社会民主主义提供一个有效的“后社会主义”理论框架。

参考文献:

- [1] 吉登斯. 第三条道路及其批评[M]. 孙相东,译.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2.
- [2] 马克思,恩格斯. 共产党宣言[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7.
- [3] 彼德·桑德斯. 资本主义: 一项社会审视[M]. 张浩,译.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5.
- [4] 吉登斯. 失控的世界: 全球化如何塑造我们的生活[M]. 周红云,译.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1.
- [5] 吉登斯. 第三条道路: 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M]. 郑戈,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 [6] 吉登斯. 后社会主义时代的政治界分[C]//郭忠华. 全球化时代的民族国家.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0: 157-160.
- [7] 吉登斯. 超越左与右: 激进政治的未来[M]. 李惠斌,杨雪冬,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 [8] 布莱尔. 第三条道路[C]//杨雪冬,薛晓源. “第三条道路”与新的理论.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25.
- [9] 吉登斯. 为社会学辩护[M]. 周红云,陶传进,徐阳,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 [10] 吉登斯. 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 权力、财产与国家[M]. 郭忠华,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0.
- [11] 吉登斯. 现代性的后果[M]. 田禾,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1.
- [12] 布莱尔. 第三条道路: 新世纪的新政治[C]//陈林,林德山. 第三条道路: 世纪之交的西方政治变革. 北京: 当代世界出版社, 2000: 5.
- [13] 吉登斯. 左派瘫痪之后[C]//杨雪冬,薛晓源. “第三条道路”与新的理论.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64-65.
- [14] Russell P H. The future of social democracy: views of leaders from around the world [M]. Toronto: Press of Toronto University, 1999.
- [15] Giddens A. A contemporary critiqu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M]. London: Macmillan Press, 1995.

Transcending revival: Giddens's post-Socialism characteristic of “The Third Way”

WANG Mu-sen^{1 2}

(1. School of Law and Politics,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China;

2. Party School of the Ninghai of CPC, Ninghai 315600, Zhejiang,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used text theme analysis to explore the intrinsic characteristics of Giddens's “The Third Way” politics. This paper hereby believes, Giddens's transcending the Left and the Right, revival of social democracy and “The Third Way” politics constructed by regulating the Capitalism with ethical Socialism are of the post-Socialist ideology, and in this kind of transcending for revival is the distinct post-Socialism characteristic of “The Third Way”.

Key words: Giddens; The Third Way; post-Socialism; transcending revival